

突破二元对立：综合高中作为职普融通实践载体的困境与出路

张定伟

民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甘肃民乐

DOI:10.62836/jer.v4n1.0993

摘要：在当前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深化职普融通的背景下，综合高中被寄予破解“普职二分”传统格局的厚望。但实践表明，其发展深陷于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之中。本文旨在剖析综合高中作为职普融通关键载体所面临的核心困境及其出路[1]。研究发现，困境主要表现为身份归属的模糊性[2]，使其在既有管理体系中难以定位，育人目标的摇摆性，在升学与就业双重压力下失去特色；课程体系的拼凑性，难实现学术与职业知识的有机融合；以及评价导向的撕裂性，单一标尺迫使学生在高中早期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究其根源，在于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社会分层的文化烙印及知识等级的隐性秩序共同固化了二元对立体系。为突破此困局，本文提出构建“融合型”综合高中的三大方略，其一，推动身份重塑[2]，从“双重依附”转向确立其“独立类型”的法定地位；其二，致力课程重构，超越“知识拼盘”，创建以项目式学习为核心的融合课程范式；其三，探索评价革新，建立多元能力评价体系，为学生成长导航。本研究为综合高中实现从理念到实践的实质性突破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洞见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职普融通；综合高中；二元对立；课程整合

Transcending the Binary Divide: The Predicament and Path Forward for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as Vehicles for Vocational-General Integration

Dingwei Zhang

Minle 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School, Minle, Gansu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rrent efforts to diversify upper-secondary education and deepen vocational-general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are entrusted with the significant expectation of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general-vocational dichotomy”. However, practice reveals that their development is deeply mired in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herent to this binary divid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ore dilemmas faced by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as key vehicles for vocational-general integration and explore potential solutions [1].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se dilemmas primarily manifest as: the ambiguity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y [2],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osition them within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 the vacillation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leading to a loss of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dual pressures of preparing stud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patchwork nature of curriculum systems, hinder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knowledge; and the divisiveness of evaluation paradigms, where a single measurement standard forces students into an early, mutually exclusive choice. The root causes lie in the path dependency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cultural imprin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hidden hierarchy of knowledge types, which collectively reinforce the binary system. To break this impas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model: First, promoting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2], shifting from “dual dependency” towards establishing its statutory status as an “independent type”; second, committing to curriculum reinvention, moving beyond a “disjointed curriculum” to create an integrated paradigm centered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ird, pioneering evaluation reform by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ability assessment system to guide student growth. This study provides systematic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athway references for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to achieve a substantive breakthrough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Keywords: vocational-general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s; binary oppositio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1 引言

1.1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的时代诉求[3]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核心在于构建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当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在迈向普及化的进程中，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在教育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4]明确将“推动职普融通”作为优化教育类型定位、实现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关键路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割裂的现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对人才的知能结构提出了全新要求，市场亟需大量既具备扎实学术基础、又掌握精湛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传统的“普职二分”培养模式导致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脱节，已难以适应新经济业态对人才跨界融合能力的要求。与此同时，“内卷”与“分流焦虑”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5]，加剧了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压力，也催生了家长与学生普遍的教育焦虑。在此背景下，推进“职普融通”已不仅是一种教育模式的调整，更是缓解社会焦虑、拓宽成才路径、实现教育公平的紧迫任务。而综合高中，以其兼具升学预备与就业指导的双重功能，

被视为承载这一战略、打破二元对立格局、为学生提供多元化自主选择权的关键实践载体与战略性突破口[3]。

1.2 理论审视与研究进路[6]

既有研究对综合高中发展困境的探讨形成了三种主要路径。资源配置视角强调师资、课程与经费的不足；制度设计层面关注学分互认、学籍转换等机制障碍；文化观念角度探讨“重普轻职”的社会认知影响。这些研究虽具启发性，却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它们大多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求改良方案，将问题简化为资源投入不足或机制衔接不畅，未能触及职普二元分割这一根本性的结构矛盾。为突破这一理论困境，本文建构“制度性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割视为通过制度安排、知识建构与文化实践不断再生产的社会建构。基于此框架，研究遵循“现象解构—本质剖析—路径重构”的逻辑理路展开：首先通过呈现身份模糊性、目标摇摆性、课程拼凑性、评价撕裂性四重现实困境，揭示综合高中在既有制度中的生存窘境，最后提出确立独立类型地位、构建融合课程范式、创新多元评价体系三位一体的突破路径。

2 综合高中在二元结构中的现实困境

2.1 身份之困：“非普非职”的制度性尴尬[7]

综合高中在现行教育体系中最根本的困境在于其“非普非职”的模糊身份，这导致其在招生、学籍与管理等关键环节面临深刻的系统性排斥，使其沦为二元分立结构中的“制度孤岛”。

在招生环节，综合高中陷入“双重标准”的夹缝。它既无法像优质普通高中那样凭借学术声誉吸引高分考生，也难以像职业高中那样通过明确的技能培养定位和就业渠道吸引特定意向的学生。这种定位模糊直接导致其生源结构复杂、学业基础差异巨大，为后续的教学组织与人才培养埋下了巨大隐患[8]。在学籍管理上，综合高中面临“非此即彼”的刚性约束，当前的教育统计与管理信息系统严格遵循“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二元分类。综合高中的学生必须被强制归入其中一类学籍，这使得旨在“推迟分流”、“探索选择”的办学初衷在制度层面被根本否定。在管理体系环节，综合高中遭遇“权责不清”的治理困境。在行政归属上，它究竟应由主管普通教育的基础教育部门管理，还是由主管职业教育的职成部门负责，抑或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跨部门的协同管理机构？在现实中，这种归属不清直接导致其在资源分配上被边缘化。

2.2 目标之困：升学与就业的“精神分裂”

综合高中的核心使命本应是打破升学与就业的人为界限，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路径[9]。然而，在“崇尚学术”与“技能报国”两种教育哲学及社会价值观的剧烈拉扯下，导致办学实践中的系统性混乱与自我异化[5]，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功标准”在同一教育场域内的激烈竞争。一方面，来自政府考核、社会声誉与家长期待的“升学率压力”构成了强大的“隐形指挥棒”；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又要求其承担“技能人才培养”的职责。这两种目标本可调和，但在资源有限、评价体系单一的现实中，学校往往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

这种内在冲突直接导致了办学实践的异化。最典型的表现是“隐性分层”或“校中校”模式的出现，学校名义上提供自由选择，实则根据学生的入学成绩或统考成绩，将其“内部分流”至以升学为目标的“普高班”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高班”。两类班级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进度上截然不同，形成“一校两制”的割裂局面。最终，这种目标上的摇摆与分裂，使得综合高中在育人成效上陷入“双输”窘境。其学术培养的深度与强度难以与顶尖普通高中竞争，其技能训练的系统性与针对性又无法媲美优质职业院校。其结果，既无法在升学竞争中展现优势，也无法在就业市场上建立声誉，其独特的“综合性”价值在这种异化过程中被消解殆尽。

2.3 课程之困：知识拼盘与融合鸿沟

综合高中课程建设的核心困境，在于其普遍采用的“知识拼盘”模式未能触及职普融通的本质，反而因机械叠加不同体系的课程内容，加剧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与认知割裂。以常见的“1+2”或“2+1”模式为例[7, 10]，其本质上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习普通文化课程，另一段时间集中学习职业技能课程[11]。这种机械性课程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回避了知识整合的核心挑战。真正的融合是需要构建一个贯通学术思维与技术思维的学习框架，然而，“1+2”模式恰恰缺失了这种以真实问题或核心素养为纽带的跨学科整合设计，导致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在教学逻辑、评价标准上各自为政，形成“两张皮”[12]。

2.4 评价之困：单一标尺与多元路径的冲突

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与职普融通的理想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其困境在于旨在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路径的“职普融通”，在实践中却被“普通高考”和“职教高考”这两套平行且泾渭分明的制度所牵制，迫使学生在高中初期就做出“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下面这个表格（表1）梳理了这两种高考制度的主要差异，它们共同构成了学生和家长必须面对的“单选题”。

表格中清晰的差异，在现实教育场景中则转化

表1. 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的差异

比较维度	普通高考	职教高考
核心导向	侧重学术能力与理论知识水平	强调职业技能与实践能力
考试内容	统一的学科知识考核	“文化素养+职业技能”模式，其中职业技能占比高
升学路径	主要通往普通本科院校	主要通往职业本科、高职专科，且本科招生规模和院校层次仍有待提高
社会认可度	传统意义上的主流路径，社会认可度高	面临认识不充分和认可度不高的困境

为学生和家长面临的具体压力与冲突，学习路径的不可兼容性，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在备考内容和能力要求上存在本质区别。一旦学生进入以普通高考为目标的学术轨道，其课程将深度围绕考试科目展开，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进行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反之亦然。综合来看，旨在打破界限的“职普融通”，在现行评价体系下，其价值确实有落空的危险。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如同两条平行轨道，不仅承载着不同的知识考察，更附着着不同的社会资本与未来预期。

3 构建“融合型”综合高中的核心方略
3.1 从“双重依附”到“独立类型”

让综合高中从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夹缝”走向独立的“第三元”，确需系统性的顶层设计[8]。

1.明确法人地位与类型界定

目前，我国公立中小学在法律上通常被视为独立的法人，综合高中可作为探索，在法律层面被明确界定为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并列的独立学校类型，而不仅仅是后两者的简单叠加或附属。可通过修订《职业教育法》或地方性教育法规，赋予其明确的法人资格，使其在民事活动中能独立承担权利义务，为其办学自主权奠定基础[13-15]。

2.政策体系的配套支撑

在法律框架确立后，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将其落实。首先，在招生计划中，应为综合高中设立单独的招生类别和序列，使其录取标准、方式更能体现其教育特色，而非完全依附于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在学籍管理上，可探索建立更具弹性的“综合高中学籍”，并在其中设计灵活的流转机制。其次，课程与教学的评价指引，建立独立的综合高中质量评价体系至关重要。这套评价体系不能简单套用纯学术导向或纯技能导向的标准，而应重点关

注其“职普融通”的成效[16]。

3.资源配置的精准保障

独立的地位和政策需要相应的资源来支撑。综合高中的师资队伍建设需要突破传统，要建立“双师型”教师的专门培养、认证与激励机制，可以积极探索教师“跨校走教”等柔性流动机制，促进普通高中与文化课教师、中职学校与技能课教师的资源共享与教学协作[17]。在经费投入上，应设立综合高中办学的专项经费，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均拨款标准，该标准应能体现其办学成本通常高于单一类型的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确立综合高中的独立类型地位，本质上是推动高中阶段教育从“非普即职”的二元对立，走向更为丰富、多元、开放的“三元协调”生态[18]。

3.2 课程重构：从“知识拼盘”到“素养融合”

要突破“知识拼盘”的窠臼，综合高中的课程重构必须实现从简单叠加到有机整合转型，其核心在于构建一种以真实问题为驱动、以核心素养为统领的融合课程模式[19]。课程设计的逻辑起点应从“学科体系”转向“实践场域”[20]。在此过程中，学科知识不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工具，职业技能也不再是孤立的操作训练，而是实现创造性方案的必要手段。

课程实施的关键在于创建高度灵活、可选择的“模块化课程群”。为避免新的课程体系陷入僵化，可将其解构为“基础通识模块”与“主题探究模块”两大层级。高一阶段以“基础通识模块”为主，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文化基础与核心素养，教学内容应注重与生活、科技的广泛联系。从高二开始，学校提供多个平行的“主题探究模块”，每个模块都是一个微型的融合课程体系，围绕一个核心领域，整合了相关的学术要求与技术实践[21]。

3.3 评价革新：从“筛选工具”到“成长导航” [20,22]

为支撑综合高中实现真正的职普融通，其评价体系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服务于选拔与分流的“筛选工具”，转向激励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成长导航”。这一转变的核心是构建一套“学术与职业能力双认证”的毕业生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高校招生建立与之衔接的多元录取机制[21]。系统设计“学术与职业能力双认证”的毕业生标准，这意味着，综合高中的毕业生不应再被单一的文化课成绩所定义，其学业成就必须同时体现在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两个维度。这一标准可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术能力认证，学生需完成普通高中核心课程的学习，其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达到合格以上标准；另一方面，职业能力认证，学生需在至少一个职业方向上，完成一系列模块化技能课程的学习。这种双认证体系的价值在于，它从制度上确立了学术能力与职业能力的等值性，任何一方的成就都获得官方认可，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重普轻职”的评价偏见。

创建记录完整学习历程的“综合素养档案”[23]。这套档案应超越传统仅记录期末成绩的成绩单，应全面、动态地呈现学生的成长轨迹，其内容应重点收录项目成果、技能证书及反思日志等。在项目成果上，收集学生在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中的设计方案、研究报告与实物作品；在技能证书上，收集获得的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竞赛获奖证明；在实践记录上，参与社会实践、职业体验、志愿服务的详细情况及评价。这份档案的核心功能，在于将评价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使其成为引导学生自我认知、自主发展的“导航仪”，而非仅仅作为毕业时的“判决书”。

推动高校招生录取与“综合素养档案”的深度衔接，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的决定性因素[24]。必须强力推动高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与高等职业院校，在招生中实质性参考综合素养档案，设立“综合素养评价”招生通道，部分专业可划定一定招生比例，对达到“双认证”基本要求的学生，

依据其综合素养档案进行综合评价录取。高校可组织专家对档案中的项目成果、实践经历进行评审。作为多元录取的“重要参考”，在“三位一体”等综合评价招生模式中，大幅提升综合素养档案的权重，使其与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共同构成录取依据，让学生的实践成果与个性特长在升学中发挥实质作用。通过这一系列紧密衔接的设计，评价体系才能从僵化的“筛子”变为充满活力的“泵”，不断激励学生发展综合素养，最终为综合高中实现其“多元成才”的使命提供强大的系统支撑。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剖析综合高中在身份归属、育人目标、课程体系与评价机制上面临的四重困境，揭示其发展受阻的深层根源在于“普职二分”的刚性教育结构。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旨在实现职普融通的综合高中，反而在既有制度框架内陷入“非普非职”的尴尬境地，其独特的育人价值被消解。因此，推动结构性创新是综合高中实现其核心使命的唯一出路，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在旧有体系内的修补逻辑，致力于从治理体系、课程模式与评价制度三个维度进行根本性重构，通过确立其独立类型地位、创建融合性课程模式、并构建与之匹配的多元评价体系，方能真正打破二元对立，使综合高中从“制度的夹缝”走向“创新的主干道”，最终成为支撑人才多元化成长的重要教育载体。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主要基于政策文本与理论推演，在实证数据的广度和深度上尚有拓展空间。综合高中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其结构性创新的成效需要经过长期检验。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开展两方面的深入探索：其一，进行纵向的长期追踪研究，持续关注特定试点区域或学校在实施新的治理、课程与评价模式后，对学生发展路径、学习成效及生涯前景产生的实际影响；其二，推动跨省域的对比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教育基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比较分析不同地域背景下综合高中发展的多样化路径、面临的特殊挑战及形成的特色模式，将有助于提炼出更具普适性和适应性的发展理论，从而为我

国高中阶段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提供更为坚实和丰富的实证依据。

参考文献

- [1] Harlow G. Unger.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ducation (Volume 3)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7. 290.
- [2] 王福建,王阳.我国综合高中发展的价值向度、现实问题与路径突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14):14-19.
- [3] 祁占勇,吴仕韬.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是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关键之举[J].中国教育学报,2024,(05):36-41+88.
-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J].高教学刊,2025,11(S2):2+195.
- [5] 刘晓,张子益.教育强国背景下职普融通的理论审视与思考——2024年职普融通研究与实践新进展[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02):31-38.
- [6] 曾天山,苏敏,李杰豪,等.我国推进职普融通的实践探索、现实困难与应对策略[J].中国教育学报,2024,(05):42-47.
- [7] 刘丽群.我国综合高中发展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J].教育研究,2013,34(06):65-71.
- [8] 巫阳朔,章建石,郭学恒,等.新时代高考内容改革:理论、实践与成效[J].中国考试,2024,(04):12-19+102. DOI:10.19360/j.cnki.11-3303/g4.2024.04.002.
- [9] 田志磊,薛懿,殷利.高中阶段普职分流:误解、事实与愿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43(02):105-118. 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5.02.009.
- [10] 郭静,何飞红.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综合高中发展的行动逻辑、历史镜鉴与推进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6):20-25+36.
- [11] 张志勇.大力推进普通高中多元办学[N].中国教育报,2010-03-20(003).
- [12]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专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01):8-13.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2,(03):504-512.
- [14] 黄晓玲.新时期我国高中阶段普职融通的理性审思——兼论高中教育综合化发展趋势[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8(01):57-61. DOI:10.13763/j.cnki.jhebnu.esc.2016.01.010.
- [15] 刘来兵,陈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动因、框架与路向[J].现代教育管理,2021,(11):106-112. DOI:10.16697/j.1674-5485.2021.11.014.
- [16] 朱晨明,朱加民.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2,(06):21-28.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2.06.012.
- [17] 张文丽.教师交流轮岗制度: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基于专业资本的视角[J].教师教育学报,2025,12(01):116-126. DOI:10.13718/j.cnki.jsjy.2025.01.013.
- [18]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12-22(001). DOI:10.28655/n.cnki.nrmrb.2022.013866.
- [19] 徐晔,麦艳航.综合高中建设的国际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特色[J].中国基础教育,2025,(06):41-45.
- [20] 邹庭瑾,谢昊伦.世界教育强国综合高中的取径与中国方案[J].教育发展研究,2024,44(20):8-17.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4.20.003.
- [21] 谢勇旗,田宝华.职普融通理念下综合高中课程设置的国际经验和本土化启示[J].教育与职业,2025,(09):79-87.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5.09.013.
- [22] 张伟.《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评价要求[J].教育科学论坛,2022,(10):5-10.
- [23] 于峰.CIPP 评价模型应用于高中生综合评价的实践探索[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2):101-103.
- [24] 贾旻,张一璇.多样化发展背景下综合高中如何破局: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5,(14):14-23.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5.14.012.

